



博闻

正月十五自古就是中国人的狂欢节

如果说大年是一台全民参与的民俗大戏,正月十五元宵节就是这部大戏的压轴节目。元宵典型的习俗是灯会,因此元宵又被称作“灯节”。元宵起源的一种说法跟佛教有关,西域摩揭陀国每年十二月底(相当于中国夏历的正月十五),要在城内做燃灯法会,纪念佛祖。随着汉明帝迎经白马寺,佛教合法进入中土,正月十五燃灯表佛的习俗也逐渐为人们所习用。灯彩有很好的视觉效果,对于营造节日气氛来说,它与春节的爆竹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元宵灯会的兴盛从隋唐开始,历代相沿。隋炀帝杨广是一个爱热闹的人,每年元宵他都要在都城洛阳举行盛大的灯会,招待外国使者,以炫耀中国的富庶。唐朝是一个气象万千的时代,元宵张灯风气更盛。八、九尺高的百枝灯树,竖立高山之上,百里都能见到。唐高祖皇帝为了举国同乐,将以前正月十五夜的灯会,延长到三夜,规定正月十四、十五、十六官家放假三日,为了人们通宵观灯游玩,节日期间取消平时的宵禁,即所谓“金吾不禁”。

宋朝城市生活进一步发展,元宵灯火更为兴盛。帝王为了粉饰太平,与民同乐,元宵节亲登御楼宴饮观灯,山楼上下,灯烛有数十万盏(《东京梦华录》卷六)。张灯的时间也由三夜扩展到五夜。新增十七、十八两夜。

北方以京城为代表,唐宋时期的京城灯会一般三夜、五夜,明朝永乐年间延至十天,京城百官放假十日。正月八日至十八日,在东华门外,形成灯市,卖灯的商贩、买灯的顾客、观灯的游客络绎不绝,人物齐集,热闹非凡。明代灯市十六更盛,天下繁华,咸萃于此。勋戚内眷登楼玩看,了不畏人。《酌中志》卷二十)妇女身着白绫衫,结伴夜游,名为“走桥”,也称“走百病”,说元宵夜走一走没有腿腿病。人们到各城门偷摸门钉,以祈子嗣,名为“摸门钉儿”。太平鼓彻夜喧闹,有跳百索的、有耍大头和尚的、有猜谜语的,不分男女聚观游玩。

明代南方元宵灯会同样热闹,福建人尤其重视灯会,明人谢肇淛说:“天下上元灯烛之盛,无逾闽中者。闽方言以灯为丁,每添设一灯,则俗称为‘添丁’。有人自十一夜开始燃灯,至十三日晚,则家家灯火,光照如同白昼。”清代的元宵灯市依旧热闹,只是张灯的时间有所减少,一般为五夜,十五日为正灯。北京元宵的灯火以东西四牌楼及地安门为最盛。花灯以纱绢、玻璃制作,上绘古今故事,以资玩赏。冰灯是清代的特殊灯品,由满人自关外带来。这些冰灯,华而不侈,朴而不俗,极具观赏性。放烟火是清代北京元宵灯会的项目之一。圆明园宫门内,正月十五会按例放烟火盒子。

元宵的热闹吸引着乡村、城市的居民,他们纷纷走出家门,看戏、逛灯、猜灯谜,走百病、闹元宵,连平日隐藏深闺的女子这时也有了难得的出游机会。男妇嬉游,是元宵特出的人文景观。司马光是有名的礼法之士,他的夫人在元宵夜打扮着准备出门看灯,司马光说:“家中点灯,何必出看?夫人回答说:‘兼欲看游人。’司马光说:‘某是鬼耶?’看人,的确是宋明以后传统社会中罕见的机会,平时限制在各自的封闭时空中的人们,是难得有聚会的日子。正月元宵是一年中唯一的狂欢节,人们在这一阶段打破日常秩序的约束,实现着本性的感官的愉悦。人们祈求婚姻的美满、子嗣绵延、身体的康健与年岁的丰收。有人说元宵是中国古代的情人节,似乎有几分道理。(据《中国节日四大传统节日》)

百科

找备份地球是杞人忧天?

近日,美国科学家研究发现,人类的生命极限可能是115年左右。那么人类寿命到底有没有极限?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黄嵩说:在不改造基因的情况下,人类天然的生命应该是有限度的,但至于这个极限是多少岁,目前还是个未知数。

我们的寿命被什么左右?

基因 黄嵩表示:遗传基因对人类的长寿至关重要。美国人口学家杰伊·奥利斯斯基的研究印证了黄嵩的观点。他和他的研究小组,用11年时间,对410名百岁老人进行寻访调查后发现,他们父母的平均寿命比当时一般人要高9-10岁。这说明基因构成对寿命有着很大影响。

干细胞 人体衰老其本质是细胞衰减,而细胞的衰减又主要由干细胞衰减所致。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韩忠朝说。在理想的情况下,这些干细胞可以维持我们一生的需要。但是现实是残酷的,宁夏人类干细胞研究所首席科学家李玉奎指出,随着人们年龄的增加,人体内很多种干细胞的活性和再生能力也在降低。

生活习惯 虽然人是否能长寿多少有点天命难违的意思,但这并不是说后天的生活习惯对人的寿命完全没有影响。除了生活习惯之外,生活的环境也能影响人的寿命。

有没有方法可以抗击衰老?

端粒酶 我们身体里几乎所有细胞都有23对染色体,每个染色体都包含一条长长的DNA分子链,在分子链的末端存在一个叫做端粒的结构。科学家发现,从某些干细胞中可以提取一种端粒酶,在这种酶的作用下,端粒酶可以重新变长。

药物 雷帕霉素就是其中之一。它是一种用于预防器官移植排斥的药物,而其靶标(指具有药效功能并能被药物作用的生物大分子,是药物中起主要作用的精华成分)雷帕霉素靶蛋白,对营养非常敏感。当细胞营养充足时,雷帕霉素靶蛋白会促进细胞生长,一旦营养不足,它就会让细胞回收自己的老化分子,对其进行加工,变废为宝,自我循环。(据《科技日报》)

纯正血统并不存在

千百年来,在几乎所有的族群中,血统的观念一直深入人心,至今许多人仍然以血统纯正为荣。然而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,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的百分之百纯正血统。血统对应的现代科学概念是遗传谱系,即由DNA承载的可以在世代间传递的遗传信息。

我们先来看看血统是怎样传承的。姓氏传承是我国汉族人很有特色的一种文化,血统往往是与姓氏的传承绑定在一起的,当然在其他族群或国家也有类似情形。每个人的遗传物质一半来自父亲,一半来自母亲。一个张姓的男性实际上继承了李姓母亲一半的血统,他与王姓妻子生下的儿子则同时继承了张、李、王三个姓氏的血统,而他的儿子与陈姓妻子生下的孩子则同时继承了张、李、王、陈四个姓氏的血统。依此类推,很容易理解为何所谓的纯正血统没有任何意义,也完全不存在。即便是有些场合血统特指纯父系遗传的Y染色体,也由于其所占个体遗传物质比例很小,容易在世代传递过程中丢失,并且完全忽略在人类繁衍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女性而意义不大。

族群的起源和演化与以上姓氏家族的传承有相似之处。同样的道理,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所谓的纯正血统的民族。历史上颇具影响力、曾经以其独特血统为荣、至今我们依然耳熟能详的一些民族,都不是血统纯正的族群,更不用说那些以宗教或政治因素构建出来的民族了。

可以说,没有一个民族是从天而降、凭空产生的。这也意味着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,如果往前追溯一段时间,必定会发现与其他民族有共同的起源。通俗地讲,我们的血液中流淌着其他民族的血液。

随着现代交通和通讯的发达,人群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,异族通婚甚至跨国婚姻已经司空见惯。按照这个趋势,人群之间、民族之间、种族之间的遗传学界限必将趋于更加模糊,这也是人类族群未来发展的趋势。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提升,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,我们与非我族类的共同之处,比想象的更多。(据《北京日报》)

花架子 官架子

架子,是用来放置器物或支撑物体的,如书架、衣架。但若其摆满虚荣和面子,就是花架子,摆上官威和官气,就是官架子。这样的架子并不少见。

自古为官者都把口碑看得很重,功德碑、万民伞往往是对官员为官一任的最好褒奖。四川眉州人杨叔贤,官至郎中,曾讲过这样一个段子:有个新太守上任,当地布置了大规模欢迎场面,新太守一到,锣鼓喧天,那些演奏的乐人齐声喊:为报吏民须庆贺,灾星移去福星来!意为前任鱼肉乡民,新任才是好官,新来的官员上任,百姓必须庆贺,因为灾星已去,福星来临。太守听后大喜。几天后,太守叫来乐人问道:欢迎我的口号是谁写的?乐人回答说:这是本州一直沿用的老规矩,自古以来只有这一首,谁知道是谁写的啊。(宋·文莹《湘山野录》)

见到恭维话,难免喜上眉梢,若是毫无根据的溜须之词,就是花架子。《官场现形记》中有位胡统勋,为了搞些政绩,把村民当土匪剿。事后,又花了3万两银子托人买了把万民伞,上报邀功请赏。这种花架子简直就是祸害,有些危言耸听,但现实中还真会有。多年前,央视就曾报道安徽省有个好大喜功的乡

镇党委书记,搞了个“四方工程”:万亩黄花草、万亩绿色长廊、万亩蔬菜、万亩养鸡。扒了成片农房,把农民赶进窝棚、桥洞里,一住就是一年多。自古以来只有这一首,谁知道是谁写的啊。(宋·文莹《湘山野录》) 而官架子的历史,悠久且顽固。古代为官,常言“爱民如子”,其实还是一种官架子,认为老百姓比自己矮一截,低一等。出行是显示官威的最好方式,文官坐轿,武官骑马,肃静回避,前呼后拥,派头十足。 孙叔敖相楚,身为总理,却乘低级官员用的栈车,拉车的还是匹母马,吃的是粗茶淡饭,孔子说这哪

走笔

行,叫下级如何做?要把他们逼到什么地步?汉代鲍宣官级至代二千石,要乘4匹马拉的车,可他厉行简朴,坐小排量1匹马拉的车,因此被罢官。

正如习近平同志在《之江新语》中所言:群众看一名干部是否称职,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看其官样子做得好不好,有没有官架子。现在确实有少数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不是很好,官样子不咋的,官架子倒不小。官架子是用权力搭起来的,好话听多了,容易把自己宠坏。只有放低身架,才能提高身价。(据《讽刺与幽默》)

每到缺钱倍思亲



每到缺钱倍思亲 (据《讽刺与幽默》)

清代官绅的退休生活

清代官绅优游林下者有之,而安于此者亦复不少,不可得此境遇者则更多,他们的晚景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。

醉心撰述

以文字为生的学者,或以撰著为主要职责的官员,无论在什么年龄段,对于研究学术都有兴趣,到了老年,仍孜孜不倦,继续著书立说,以之为人生的追求。

思想家、史学家黄宗羲(1610-1695年)著述等身,年过花甲之后,新著和总结以前的著作又出了一批。他是浙江余姚人,平时阅读诸家文集,凡是关涉到家乡的文字都记录下来。到63岁(1672年)时,将《姚江逸语》十五卷梓刻行世,同时还辑有《姚江文略》《姚江琐事》。次年宁波天一阁阅览,把流通不广的书抄出书目,其他学人辗转抄写,从而使之流传于世。

顺康时期的诗坛祭酒王士禛(1634-1711年)成名甚早,然而终身在写作诗文。康熙三十四年(1695年)62岁,任户部侍郎,将以前的诗词和杂文汇编为《蚕尾集》,古文词另编成《渔阳文略》。次年奉命去川陕祭祀山川,写诗百余篇,集成《雍益集》。辞世前一年已病得很厉害,仍有《己丑庚寅近诗》问世,同时《渔阳诗话》也编成。可见,他在晚年,年年有新作、新书,与黄宗羲一样始终没有停笔。

以上诸位,晚年仍醉心于写作,究其原因,约有3种。其一,多年形成的习惯,继续青壮年时期的事业,是学术追求的延续。其二,为了丰富晚

年的生活,将精力用到著书立说上,他们没有别的嗜好,只有靠读书写作来消磨时光。在清代,人们的休闲生活比较单调,官绅纵有经济条件举行老人诗会,也很难经常进行。而阅读写作,令精力有处使,可减少精神上的苦恼。其三,为了生活,不得不行文卖钱,以养家糊口。

优游林下

官员告老还乡,不必案牍劳形,也可以放下“伴君如伴虎”的心理包袱。这种人可以说是无官一身轻,应当可以养尊处优、颐养天年。确实有这么一批人。

福建长乐人梁章钜(1775-1849年),官至江苏巡抚,道光二十二年(1842年)68岁休致,寄居福建浦城4年余。自道光二十六年(1846年)至二十九年,他游遍太湖水域和长江下游的南北各地,观赏名胜古迹,访问旧友新朋。他每去一处,绝非走到为止,而是考订掌故,满足求知的心愿。在与友人的聚会中,必有唱和,因而记录成《浪迹丛谈》,刊于道光二十七年,次年刻出《续谈》,辞世之年刻印《三谈》和《巧对录》。

满洲旗人麟庆(1791-1846年),官至南河河道总督,道光二十二年因河决而罢官,其长子崇实认为乃父以十余年两河劳瘁,一旦卸肩,反觉优游,因而赶紧在北京整理家园,并求田间舍,为娱亲之计,建成半亩园。麟庆到京,命长子夫妇主祭,自己表示不理家政,以颐养为事。同时,访多年老友,相约游山。携带二子东之、蓊县盘山,历经上中下三盘,趁行宫除草

之机,得领略其风光一二;北游居庸关,观赏明十三陵,到汤山洗温泉浴;西游西山,谒名刹和名胜,碧云寺、大觉寺、黑龙潭和玉泉山皆为足迹所到之处;西南去丰台,观赏芍药,再前行至房山,拜谒金朝皇陵。但是他也用心,每到一地,就探其历史和特点,并且记录下来。

优游林下者与前述醉心写作者有所不同,一种是生活享受为主,著作为辅;另一种则反之,几乎是一心钻研学问,生活享乐放在相当次要的地位。然而两者亦有共同之处,即都有追求。优游林下者并非醉生梦死,他们的游山玩水、享受人生,有着求知欲望,希望能把看到的事物弄明白,获知其原委。此乃较高层次的精神享受,与纯粹的追逐物欲有明显的区别。

致力族务家政 麟庆不关心家务,是老年官绅的一种类型。另有一批人热衷于家族的事务,倡办或兴办家族公共事业,修家谱,建祠堂,祭祖坟,开族会,办义塾,训子弟,以此为荣,而不知疲倦。这同样是一种追求,在南方人中较多出现。

安徽定远人方士淦(1787-1849年),在知府任上被遣戍新疆,42岁东归,48岁建立家族支祠,以奉祭祀。50岁率领三弟校定宗祠所藏家谱,用聚珍版刷印成书,计印60部。次年,到徽州休宁祖坟上祭,原来有个族人在其祖墓旁立坟,听说他要回来,忙着将坟迁走。他到后,大会族人,祭宗祠,并写出此行的《纪略》一卷。看来,他把祭祖修谱作为晚年的

知识分子

为什么不愿意承认自己错了?

当他人说起自己在某些事上做法不妥当时,人们通常的反应是:我做得哪有那么过分。即便证据确凿,人们也常常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过错。我们为什么不愿意相信是自己错了? 首先,人们可能选择性地遗忘自己做得不对的事,这种现象叫“非道德健忘症”。美国西北大学商学院和哈佛商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,人们会清楚地记得自己做过的好事、正确的事,但对于自己不合情合理的行为则记忆不深刻。这可能是人们为了保护道德自我的选择。

(据《家庭百科报》)

大观园

人生要务,并坚持不懈。

不得卸肩 大臣在位,有的年老了仍恋栈不思引退,因而隐瞒年龄。但也有另一类人,到了老年,怕出差池,也有厌倦政事的情绪,遂生归田颐养之卸肩之望,因此乞请休致,然而却不一定能如愿。

蒋攸钰(1766-1830年),历任直隶总督、大学士、军机大臣。道光七年(1827年)皇帝命他以大学士出督两江,蒋氏具疏辞谢未成。次年奏称:臣服官中外,有公是非而无私好恶,己从不回护,于人何肯瞻徇?可知圣眷已大有问题。十年(1830年)春因盐案被责问,9月奉命内召,因而对儿子说了心里话:我年来精力日衰,难胜重寄,以受恩深,不敢请(退),到京可以摄医宿疾,或许身体能好起来。哪知行到半路,被革职,病死在山东平原县。

林则徐(1785-1850年)于道光二十五年(1845年)年逾花甲时从新疆戍内地调,先后任陕西巡抚、云贵总督。这中间思想颇为矛盾,身体也不好,一方面想为国出力,一方面又感到世事掣肘,所以希望卸去陕甘总督署任,返回内地。当道光三十年家居时,设亲书,课戚中子弟,有享受天伦生活的味道。十月初一日接到赴广西钦差大臣的任命,次日即抱病起程,半月后行到潮州而仙逝。

大臣能否卸肩,要看皇帝的眷注程度,本人的思想状态,世事的状态。多种因素综合而起作用,不是其主观愿望所能决定,这就是为官的身不由己。(据《北京日报》)

闲话

孔子的幽默

《论语》是孔子对门人说的话,很多是燕居闲话的脱口而出的幽默自得的话,甚至开玩笑及破口骂人的话,就是这些半真半假、雍容自得的闲谈实录,可以想见孔子的人情味。

御乎射乎?有人批评孔子说:孔子真伟大,博学而无所不专。孔子听见这话说:教我专什么?专骑马呢?或专射箭呢?还是专骑马好。这话真是幽默的口气。可这哪里是正经话?你若当真,煞风景是你,不是孔夫子。

其然,岂其然乎?孔子问公明贾关于公叔文子这个人怎样,听见说这位先生不言、不笑、不贪。公明贾说,这是说的人张大其辞。他也有说有笑,只是说笑的正肯合时,人家不讨厌。孔子说:这样?真真这样吗?这种重叠,是《论语》写会话的笔法呈现了活泼泼的孔丘。 赐也,非尔所及也。子贡说:我不要人家怎样待我,我就这样待人。孔子说:阿赐(你说的好容易)。我看你做不到。这又是何等熟人口中的语气。

群居终日,孔子说:有些人一天聚在一起,不说一句正经话,又好行小恩惠,真难为他们。难矣哉,是说亏得他们做得出来。朱熹误解为:将有患难,就是不懂这亏得他们的闲谈语调。因为还有一条,也是一样语调,也是用“难矣哉,真清楚。一天吃饱饭,什么也不用心。真亏得他们。不是还可以下棋吗?下棋用心思,总比那样无所用心好。

这便是《论语》所呈现的孔子的幽默,在静室对至友闲谈,一点不肯装腔作势。有一次他说,出卖啊!出卖啊!我等着有人来买我。(沽之哉,沽哉,我等贾者也。)意思是在求贤君能用他,话却不直言而出,不是预备给人听的。若认真译它,便失了气味。

孔子骂人也真不少。今从政者何如,孔子说:噫,斗筲(盛米器)。就是说:那些饭桶,算什么!骂冉求,非吾徒也。小子鸣鼓而攻之,可也。真真不客气,对门人表示他非常生气,不赞成冉求替季氏聚敛。由也不得其死然,骂子路不得好死。这些都是例子。(据《文摘报》)

地球村

德国人居然最没钱?

德国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,全球第四大经济体,欧洲经济的领头羊,可统计数据却显示,德国人均财富在欧洲垫底。

钱都花到哪儿去了? 截至2015年底,德国人的总资产额达到5.3万亿欧元,创历史最高纪录;德国人口为8200万,所以说德国老百姓在欧洲最富裕应不为过。不过,家庭净资产排名却不乐观,只有5.14万多欧元,在欧洲排名最末。连需要欧盟救助的塞浦路斯和希腊都排在德国之前。德国人的钱都到哪里去了?

据德意志银行统计,截至2015年年底,保险和养老金是最受德国人欢迎的投资理财方式,共有2.05万亿欧元的资产。除法定社会保险,个人还可以自愿购买商业养老保险。由于德国社会的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,人口结构比例失衡,导致公共养老金吃紧。为避免养老金体系崩溃,德国政府鼓励民众在法定养老金之外,额外购买商业养老保险,这部分用于买保险的钱还可以免税。这对于恐惧高税收的中产阶级来说,是一举两得之策,深受民众欢迎。

六成百姓租房住 造成德国排名垫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房地产。欧洲央行2013年的统计中将不动产计算在家庭净资产内,但德国恰恰是个租房国家,只有40%的人买了房。

为何租房在德国如此普遍?原因很简单:租房比购房划算。德国人也不热衷于炒房,因为二手房买卖要缴纳一笔巨款。卖家首先要缴纳相当于待售房产估值1%-1.5%的不动产税,房屋买卖还要交3.5%的交易税,假如通过买卖获得盈利,还要再交15%的差价盈利税。新购住房未满7年转让,综合税率更高达50%,所以从商业角度上看,炒房是得不偿失的。

民众忧患意识强 德国人厌恶风险。讲究“靠双手致富”的德国人看不上股票持有者,认为他们不劳而获,称他们是“剪羊毛的人”。这个充满贬义的词汇背后,隐藏着德国人对股票和其他证券的蔑视。

历史上,德国人也一度全民炒股。1996年上市的德国电信被称为“人民的股票”,掀起了全民炒股的热潮。而在此之前,德国仅有380万股民,到2000年股民人数超过600万。但到了2001年,互联网泡沫破灭,股市崩盘,数百万德国人仓皇逃过股市,并发誓再也不上船。

一朝被蛇咬,十年怕井绳。的俗语用在德国人身上正合适。久而久之,风险性投资理财在德国便越来越乏人问津。(据《新民晚报》)